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及其现实意义

刘香檀, 邹庆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与经典性著述对“生态本体”意涵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概括, 即同时坚持人与自然作为统一整体的自然生态的物质客观性和人类活动的主体实践性。当今世界异常复杂艰巨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挑战和新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一概念议题提供了新的语境。其一, 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恢复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唯物辩证特征; 其二,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可以通过阐发“生态阈限”“生态实践”等一系列概念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体系; 其三,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及其构建可以更坚实地确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学理性支撑。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生态本体论; 生态实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3-0024-08

对“自然事实(世界)”的叙述阐释, 是生态环境议题本身认知中的重要内容, 也往往呈现出明显不同于比如从道德价值观角度探讨社会问题的本体论表征。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态批判语境中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是建基于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新理解的话语理论, 其首要任务就是为其所主张的社会历史实践或社会主义变革(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充分的本体论论证。马克思明确指出: “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519)} 基于此, 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在不同生产方式下自然界会遭遇不同的社会性建构, 即任何一个时代的自然都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自然。但是,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叙事尤其是他对马尔萨斯推断增长自然限制的经典性批判, 在很长时间内被视为可以藐视经济生产活动中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或对反自然主义的理论支持。然而, 简单引入或回归自然本身的客观物质性, 比如承认“生

态中心主义”, 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认知传统中关于现实中人与自然之间辩证互动关系的表述相抵牾, 也不利于在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愿景。因此, 进一步廓清或彰显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本体论维度, 尤其是阐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趋势的现实可能及其社会历史条件, 不仅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关系重大, 而且具有推动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论域中的“生态本体”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马克思理论论域中的“本体”并不是旧唯物主义语境下的“追根求源”, 同样, 马克思生态思想论域中的“生态本体”也并不是简单确定人类社会与原始自然之间的演进历程或等级归属, 而是旨在表明人类社会(文明)与自然物质世界之间的深刻关联或相互作用

收稿日期: 2023-10-31; 修回日期: 2023-12-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媒介、路径、机制及其经验研究”(2022JZDZ011)

作者简介: 刘香檀, 女, 吉林通化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 联系邮箱: liuxiangtan@foxmail.com; 邹庆治, 男, 山东青州人,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

用。也就是说, 这里的“生态本体”是指一个统一整体视野之下的自然世界相对于人类社会(文明)而言的生态本原、决定、统摄意义, 或人类存在及其活动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次生、附属、依赖意义。因而,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自然世界的经验先在性、客观规律性以及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制约等质性, 但其“生态本体”的意涵并不能简化为任何意义上的自然还原论, 而应从“属人的自然”和“自然范畴中的人”之间的“共同体”关系角度去探寻。

“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这些个人同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1](519)}。因而, 马克思生态思想论域中“生态本体”追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对于他们时代的人与自然关系本质特征的概念化或理论构建。概言之,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就是以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体关系为“生态本体”, 也就是把自然界的演化史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紧密结合起来——从最初“无生命的关系”到后来的“作为生命的关系”, 再到如今的“作为社会活动的关系”^[2], 所凸显或强调的是支撑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的生态物质基础对复杂的、动态的社会代谢运行的本原重要性, 并警示人们必须自觉将生产生活与更大范围内的生物物理世界相联系、相契合, 而不是主张人与自然单一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 抑或人与自然无差别统一的“生态中心主义”。

不难发现, 贯穿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人类主体价值与自然本体价值辩证统一生态哲学思想与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品中的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制约理论观点的主线, 都是借助劳动概念来阐发的人与自然之间能动和受动相统一的关系, 即它是一个共生共存的“生命共同体”架构。比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异化劳动, 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 (2)使人本身, 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 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 因此, 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 对人来说, 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161)}。他认为, 对于人而言, 异化劳动并不是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 它把类生活的目的降格为维持肉体生存, 使人失去了个人的主体价值; 对于自然来说, 在资本统摄

之下的自然, 已经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崇拜的对象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失去自身特殊价值的物质要素。人们怎样劳动就产生怎样的人与自然关系, 因而, 异化劳动在使人失去自由自觉性、主动创造性和自我意识的同时, 也夺走了自然界表现和确认人的本质的资格, 即人的“异化劳动”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自然的异化”。

作为马克思早期哲学重要理论观点的“异化劳动”, 揭露了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作为既定事实掩盖了劳动是自然对人的本质实现的事实。就此而言, 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延续了早期生态哲学批判的思想内核, 并提供了一个更坚实、更科学的基础, 以说明人类劳动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动态的代谢变换, 再次印证了“只要有人存在, 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516)}的基本事实。一方面, 马克思认为, 生命的生产和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以自然资料为基础。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偿的自然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3](843)}, “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3](728)}, 人与自然的关系依然可以直接表现为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另一方面, 马克思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构型的新特点。他指出,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 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1](565)},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就意味着, 现代社会中人类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已经改变了古代社会中人类在与自然交往中臣服或屈从于自然的状态, 而自然界的演化已经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并被纳入社会历史进程之中。

因而, 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的, “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 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4]。如果说马克思生态学的本体论维度在内容上是围绕着对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异化关系的批判而展开的, 那么它在哲学方法论上则立足于其新唯物主义自然观。概言之, 他既基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明确承认自然(生态)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也从结构性的“经济唯物

主义”^[5]角度去理解自然(生态)物质所处其中的现实世界。

其一,从一般唯物主义立场承认自然(生态)物质的“自在”属性或客观实在性。自然生态物质是“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6](56)},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520)}。由此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的自然”这一理解维度以明确承认“自然的社会”的理解维度为前提,而“自然的社会”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中所包含的自然科学客观事实,也表现为在特定生产关系下劳动分工、阶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变的客观现实。

鉴于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的自然要素往往因无需付出额外代价而未被视作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著作中有关自然生态问题的探讨就相对缺乏超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单独性分析。但是,近年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自然科学笔记(MEGA²第四部分第18卷)研究工作的开展,为系统梳理马克思的生态批判思想提供了更充实的自然科学研究文本依据。斋藤幸平指出,马克思晚年已意识到仅靠李比希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能为生态退化批判提供足够的科学依据,因此在1868年后加强了对自然科学成果的研究;已有大量文献表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已经超越了李比希,并涵盖了地质学、化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的内容,以及过度砍伐森林、残酷对待牲畜、挥霍化石燃料和物种灭绝等新议题^[7]。

其二,从“经济唯物主义”视角分析了资本主义现实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的代谢互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未止步于对外部自然界的描述,而是通过定义一般劳动过程来分析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辩证分析模式运用于现存自然界再生产的异化形式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性和发展不可持续性的特点。这也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超越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关键点——不是把自然理解为原始纯粹的自然和宇宙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兼具物质基

础和被改造对象双重身份的社会历史的自然。基于此,马克思既强调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意识自觉和主动创造性,也坚持认为人类实践活动始终受制于外在的自然基础条件或规律。

当然,人与自然在存在论上的二元分析与二者同属于一个有机整体的一元论价值观,并不必然会冲突,而“如果现实是二元的,以一元的方式重新描述它,最终可能会使资本主义特有的现存社会力量的安排和运作神秘化”^[8]。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是一种在现实中施加的外在力量,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不可避免地需要把社会和自然作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来讨论。具体地说,马克思生态学的本体论论证就呈现为首先分别分析自然(生态)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然后再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如何实现转化和重组的,并通过对自然资料归属的讨论,达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生态本质的批判。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路下自然(生态)本体论的回归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发生了一个围绕着政治经济上的苏联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哲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等议题的“东西方分野”。结果,恩格斯晚年的许多理论系统化大众化努力,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忌讳或公开批评的理论议题。相应地,“自然(生态)物质”更多地被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对象,“自然(生态)物质本体”更多地被诠释为一般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认知。

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卢卡奇和葛兰西强调的是人类社会个体相对于自然世界的实践主体地位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自然可操控性。这些认识当然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比如,“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越了近代哲学和旧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性和意识形态功能”^[9]。但问题在于,仅仅诉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或社会历史观点并不能够充分说明人与自然关系上

的辩证性和历史性, 也不会达成他们所期待或声称的通过社会解放实现自然解放的政治愿景。换言之,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或诠释的单纯甚至过度的社会历史化有着它内在的局限性。尤其是, 这个转向或选择的突出缺憾是无法将日渐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现实的理论批判之中。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关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讨论。正如他后来回顾时指出的, 20 世纪 50 年代的时代背景对于其研究视角与观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为那时联邦德国任何从正面谈论马克思作品的做法都有可能被斥为斯大林主义的表现。在他看来, 当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对马克思的理解必须是“选择性的”, 因为根据所达到的“历史状态”, “传统学说的所有组成部分不可能总是平等地存在于其中”^[10]。而这种所谓历史状态的具体体现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观从苏联时期聚焦于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变革到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先导, 在哲学形态上则表现为将自我解放置于人类活动的范围之内, 将自然置于社会历史的范围之内, 以防止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沦落为苏联式马克思主义中的“粗俗的唯物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分析视角从本体论转向辩证法是由现实社会革命动员的困境所激发的, 那么此后出现的回归本体论趋势则是由现实遭遇的生态环境难题所引发的。在联邦德国, 第一次工业化高潮催生的大众环保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反工业、反城市和浪漫主义文化批判的一部分, 而作为“文化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向”^[11]的政治生态学也在随后兴起扩展。此后不久, 随着生存主义和环境危机论的迅速兴起传播, 增长极限问题进入了大众政治视野。德国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 1969 年上台执政后, 生态环境问题被正式列入政府议事日程。当时的生态激进主义和生存主义普遍认为, 经济增长的限制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束缚, 而中央计划、发达工业化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受到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直到 1973 年出版的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明确指出至少存在着一个对增长的绝对性限制, 即“环境消化能源消耗所释放

出来热量的极限”, 而且这个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 而是“对所有复杂的社会系统都是有效的”^[12]。之后, 1975 年沃夫冈·哈里奇(Wolfgang Harich)的《共同宣言》^[13]、1977 年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的《东欧的抉择》^[14]、1980 年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mann)的《摩根: 处于工业社会的十字路口》^[15]等一系列著作, 都是阐述生态环境议题中增长极限、凸显生态唯物主义(现实主义)重要性的作品。在民主德国, 与政府官方和执政党把对生态环境的关切在西方国家的兴起解释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法不同, 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致力于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 揭示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成因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的内在统一性。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日益受到左翼学界重视, 并相应地划分为狭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相较于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未来绿色社会制度的设计及其战略的政治生态学批判, 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侧重于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述的理论意涵及其方法论意义。他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等不同角度做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资源与生态环境议题相结合的尝试。比如, 以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核心作者的《每月评论》上发起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重新发现”, 以及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和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在《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上所发起的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讨论。应该说, 以福斯特为代表的新陈代谢断裂派和奥康纳所支持的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理论, 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危机理论基础的理理解存在着分歧。前者认为, 对马克思而言, 生产者与自然条件之间关系的异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异化的根源, 其目的在于运用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来揭示劳动与自然的异化关系; 后者则认为, 纳入生产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生产条件一旦遭到破坏将会导致生产成本提高, 进而导致资本生

产不足、利润率下降并引发经济危机。但他们都令人信服地阐明,自然条件无论是作为“资本—劳动”关系的实在构成基础,还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源基础,都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性矛盾的基础性要素。因而,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立场来看,无论是从社会和自然关系的一般理解出发来认识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特性,还是从具体理论分析的概念和结果(如经济的和/或生态的危机模式)出发来理解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特性,“生态本体”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

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及其理论意涵的研究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具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的理论方案。“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16](17)},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构建的要旨是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具有本体论支撑作用的理论根基^[17]。应该指出,无论是包括理念目标、制度构想与战略举措等三个维度的系统整体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是习近平同志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系统阐述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18],以及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追求的三个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包含着一种强烈的“生态本体”意蕴。也就是说,大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实都是建基于一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即努力构建一种地球生命共同体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经济—生态共同体”。无疑,这同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执政党政治领导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的深刻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本体论的当代意义

与古典唯物主义的“从何而来”或“物质本

原”追问不同,“生态本体”构建与生态本体论阐发的宗旨要义是更为科学地概念化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构型或本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与经典性著述对此做出了一种既唯物又辩证的理论概括,即在一个统一整体视野下同时坚持自然生态的物质客观性和人类活动的主体实践性。应该说,这种辩证理解在当今时代仍具有重要的认知与实践方法论意义。换言之,任何有意义的或可持续的绿色认知与实践都不能依靠片面或极端的“自然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来实现,而必须致力于建立二者之间的某种形式或程度的平衡。而同样重要的是,当今世界异常复杂艰巨的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挑战和新时代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一议题提供了新的语境。

其一,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中的“生态本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恢复或重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唯物辩证特征。如前所述,马克思既十分强调人类实践的主体能动作用,也始终对自然环境条件及其演化和人类与大自然的代谢互动保持着认知自觉。“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是方法论的”,“这种社会—生态逻辑为环境社会学的核心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19]。具体来说,马克思既明确承认自然物质存在对于社会历史的基础性意义——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能量和物质变换是受到自然生态规律调节的,还特别强调社会制度条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方式对于特定时代的自然生态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变革方案同时就是一个社会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生态理想方案,“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9)}。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马克思主义环境社会学界却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主导性观点,即认为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自然”已经被由社会改造的“第二自然”所完全吸纳消解,自然

界已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关系,因而即便最终出现自然消逝或毁灭的现象,也应该归结为社会因素的作用。对此,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卡顿(William Catton)和赖利·邓拉普(Riley Dunlap)将其归因为环境社会学发展中的两个理论传统:一是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认为事物发展的原因总是社会性的,而不能通过心理学、生物学和物理学来分析;二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环境的物理特性只有在被行为者感知和定义时才有意义。总之,他们批评道,这种社会一元论遮蔽了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差异以及对大自然本身的相对独立性和非同一性的可能认知,而对“生态本体”或“生态物质性”的忽视则使其无法证明人类依赖于自然环境而生的理论命题。可以说,只要这种以社会一元论为特征的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环境社会学就很难对生态环境挑战或危机做出科学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构建并非只是复述或重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既有论述,而是在坚持其基本立场即人与自然的唯物辩证(社会历史)统一体的基础上,不断探索着眼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文明)多重挑战与危机的自然生态本体性认知、意识和实践进路。很显然,它所关涉的并非只是对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更科学的认识,还包括对自然生态系统嵌入其中的人类社会的更清楚的认识。

其次,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可以通过阐发“生态阈限”“生态实践”等概念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体系。初看起来,“生态阈限”似乎难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域中的基础性概念,因为它往往会被预设为拒斥社会历史文化考量的元素。但一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从概念构词上说都是意指“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结合,因而对二者的清晰科学界定是这一复合术语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议题的现实政治重要性的日渐凸显,已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必须更加重视自然生态系统或元素的决定性作用,包括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终极性限制(“天花板效应”或“地球边界”)^[20]。

“生态实践”在构词上也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21-22]。一方面,它表征的是人类社会或个体活动对于自然生态整体及其构成元素的充分认知、尊重和顺应,从而自然界不再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1](634)};另一方面,它表征的是人类社会或个体自觉地以社会—经济—生态的统一体作为观察、决策与行动的对象,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追求融入丰富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包括日常生活行为之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实践”概念之所以与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本体”的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因为它们都强调了人类活动或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尤其是这种活动或实践主体的社会历史维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即劳动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样态的剖析,还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状态的构想,都蕴含着进一步走向“生态实践”这一伞形(本体)概念的可能性。然而,二者之间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前者与后者的最大区别,就是明确体现了自然生态整体和价值对于人类生产生活活动的物质性、外在性、强制性约束。而“生态实践”是“以生态学原理为依据,以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规律为内在制约,以人地协调发展为价值目标和人的适度需求为根本动力的物质性实践”^[22]。总之,相较于“实践本体”,“生态实践”更加突出或彰显了社会历史的“自然基础”或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自然生态制约和依赖。

其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生态本体论及其构建可以更坚实地确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学理性支撑。当代中国,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政策及其理论话语,还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政策及其话语,都要归结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更高位阶、更为根本的科学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构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渊源基础。因而,系统地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或意涵,同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

义^[23]。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其实就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语境下发生的、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基本特征的“生态实践”,因而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层面上的本体论学理性支撑。

一方面,必须明确,合理实现物质富足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直接目标,而保持维护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无论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五位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还是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都着眼于逐步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6][23]},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理想目标、实践原则与政策检验。这背后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然确立的崭新的生态本体意识,即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意识,既是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大众性文化观念变革以及由此实现的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生态意识与行为方式革新,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可以实质性推动的国家与社会层面上自觉致力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消费节俭的新型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可以大张旗鼓地鼓励和营造与时代相适应的支撑性大众文化和行动主体的新型文化生活规范创新^[24]。换言之,大众生态意识与行为的根本性改变,不仅取决于更加生动有效的以理论宣传和思想引领为主的生态文明意识宣传教育,还有赖于适当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下的自我反思提升以及生态健康生活行为的不断累积或习俗化。

四、结论

尽管我们也可以借助人与自然关系、自然

观、生态环境价值观等范畴术语加以阐述,但“生态本体”概念似乎有着可以更为清晰深刻地表达或彰显自然生态系统的根本性、先在性和极限性等理解的理论潜能。特别是伴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开始与现实生态问题相结合,一种以现实生态问题为导向的时代化转变趋势已经展现出来。

与生态中心主义视角下的观察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生态本体论并不只是为了确定人类社会及其活动的生态物质性依赖或本原,而是力图给出一个关于当代社会(文明)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构型或本质的“社会—生态解”,而不是单向度的“自然生态解”——解决人类及其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动)性”潜能问题,并使这种主体性建立在更为牢固确实的“生态物质性”的本体基础之上^[25]。这样一种认知方式及其讨论,可以使

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自然观的生态意蕴或生态变革潜能,从而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维在当代生态文化理论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中的引领性作用,也就可以彻底地解决生态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生态学的学术争论。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同时提出了借由“生态本体”概念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时代需求与时代解答。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内容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及其现代化追求,不仅是对这样一个时代需求的自觉回应,也蕴含着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命题的当代中国想象与答案。新时代的中国,理应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梁爽.“人的本质”的自我生成何以可能——《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与重构[J].哲学研究,2022(10):31-42.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 肖峰,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8.
- [5]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 吴仲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57.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7] 斋藤幸平. 马克思的生态笔记[J]. 刘仁胜, 赵伊琳, 译. 鄱阳湖学刊, 2018(3): 34–47, 126.
- [8] SAITO K. Marx in the anthropocene: Towards the idea of degrowth commun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123.
- [9] 王雨辰. 从阶级意识理论到组织理论——论青年卢卡奇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5): 1–11.
- [10] SCHMIDT A. Die kritische theorie als geschichtsphilosophie[M].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1976: 15.
- [11] WOLF E.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ecology [J].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1972(45/3): 201–205.
- [12] 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刘北成,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48.
- [13] HARICH W. Kommunismus ohne Wachstum [M]. Hamburg: Rowohlt Verlag, 1975.
- [14] BAHRO R.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M]. London: NLB, 1978.
- [15] HAVEMANN R. Morgen: Die Industriegesellschaft am Scheideweg. Kritik und reale Utopie [M]. Norderstedt: BoD—Books on Demand, 2019.
- [1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17] 张云飞. “生命共同体”: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体论奠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2): 30–38.
- [18]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9–17.
- [19] FOSTER J B.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105/2): 366–405.
- [20] 李志青. 可持续发展的“强”与“弱”: 从自然资源消耗的生态极限谈起[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5): 1–4.
- [21] 曹家宁, 陈怀平.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及其生态正义[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3(3): 31–39.
- [22] 陶火生. 论生态实践及其基本特征[J]. 广西社会科学, 2007(4): 40–44.
- [23] 郇庆治.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析论”[J]. 学术前沿, 2023(4): 59–71.
- [24] 郇庆治. 作为一种转型政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9(2): 21–29.
- [25] 刘香檀. 重思施密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本体构建”[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82–92.

Ecological ontology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Ecology

LIU Xiangtan, HUAN Qingzhi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and its classical works, Marxist Ecology has made a materialistic and dialectical illust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Ecological Ontology." That is, it simultaneously insists on the material objectivity of natural ecology and the subject practice of human activities as a unified whole of man and nature. The extremely complex and arduous challenges of natural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oday's world and the Chinese-style countermeasure of building a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new era provide a new discourse context for us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is conceptual issue. Firstly, rethinking the issue of "Ecological Ontology" can further restore or reconstruct th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Ecology. Secondly, ecological ontology can enrich and expand the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etical system by elaborating a series of concepts such as "Ecological Threshold", "Ecological Practic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rdly, "Ecological Ontology" and its construction can more firmly establish the ontological academic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arxist Ecology; ecological ontology; ecological practic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编辑: 胡兴华]